

知识分子图书馆



布莱希特与方法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著 陈永国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知识分子图书馆

布莱希特与方法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著 陈永国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莱希特与方法/(美)詹姆逊著;陈永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7

(知识分子图书馆)

ISBN 7-5004-2297-0

I. 布… II. ①詹… ②陈… III. 布莱希特. B. (1898~1956)-戏剧-艺术理论-研究 IV. J805.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4334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125 插页:4

字数:176 千字 印数:1—6000 册

定价:13.00 元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刘象愚 汪民安 张旭东 罗 钢

章国锋 谢少波

总 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么困难，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萨义德等。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 1996 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萨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 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 60 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

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

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逊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的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

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桦、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 10. 于北京

詹姆逊关于《布莱希特与方法》的通信

亲爱的逢振：

谢谢你 12 月 9 日的来信。英国那本选集（指“詹姆逊论后现代主义”一书）尚未出版。佩里（Perry Anderson）最近才完成他的导言，因此一直拖到现在。不过，今年——布莱希特诞辰 100 周年——我写了一本论布莱希特的小书，不知你是否能找人翻译于今年年内出版？无论如何，我将书稿寄上，剪剪贴贴是为了保持所有的德语引文。……

希望加强联系。我不会参加八月召开的“全球化”会议，但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再到中国，并期望在美国见到你。我一直很忙，但一切顺利。去年夏天我们都非常愉快，相信那是一段绝好的经历。

收到书稿后请告我。

祝好。

弗雷德

1998.1.26.

亲爱的逢振：

很高兴你对布莱希特一书感兴趣。布莱希特一百周年会有不少纪念活动，如召开研讨会、上演他的戏剧，等等。我这本书就

是在这种语境中写的。我刚刚完成了最后的定稿（相对而言），比你上次收到的书稿要完整；已经用特快专递寄你，并随寄一个软盘。你会发现这次的书稿比上次长得多，可以自成一本书。不过，我不反对你作为附录加上那篇“关于布莱希特和卢卡契争论的反思”（事实上我在注释里曾提到那篇文章，如附加那篇请在注释里改为“见附录”）。但我觉得也不一定收入那篇文章，收不收请你酌定。（后来未收，原来想收是因为觉得书稿太短。——王逢振）这本书仍将 Verso 出版，相信他们会授权的。今年夏天我不会去参加会议，你若有出国旅行的计划，请及时告我。

问好。

弗雷德

1998. 3. 5.

又及：另包寄去几本齐泽克的著作。

逢振：上周寄你的书稿及软盘有些改动的地方，请按下列顺序改正过来。

弗雷德 1998. 3. 12.（传真）

（有关修改的地方已在译稿中改过。——王逢振）

译者前言

《布莱希特与方法》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1998 年的一部新作（其英文本和中译本约同时分别在中英两国出版），是为德国著名作家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诞辰一百周年（二月十日）而作的一部专论。书中融会了詹姆逊前此提出的批评理论和方法，以布莱希特的典型个案再展马克思主义和历史批评之风采，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就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层探讨，通过阐述分析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自动化、主体的双重性、多元叙事、自动指涉性以及现代性、现实性、历史性和资本主义的再现性等问题，进一步深化了他自己一向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正因如此，美国一学者断言：“《布莱希特与方法》有可能再次成为詹姆逊的传世之作。”

布莱希特是一直备受詹姆逊重视的世界文坛大师之一；这不仅仅因为布莱希特作为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的建树丰厚而最富独创性，也不是因为他与詹姆逊志同道合，都信奉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从未加入德国共产党）。在詹姆逊看来，布莱希特之所以值得我们花费气力加以详尽研究，是因为他仍然对我们“有用”。因此，本书的目的（詹姆逊开宗明义）在于挖掘布莱希特的“有用性”。但是，布莱希特虽说一生著述颇丰，涉及戏剧、小说、诗歌和戏剧理论等领域，留下的文化遗产长达二十卷，包括对话、札记、书信、文章和断片等，但所有这些“并不是累积的事实、思想、信

念、重要原则等”，未曾留下可供后人进行系统研究的所谓理论体系，而只是一些“意见和建议”，“寓言和谚语”，也即詹姆逊所说的“方法”。布莱希特在今天的价值和“有用性”就恰恰在于这些“方法”。

那么，詹姆逊又是如何挖掘这种“有用性”即“方法”的呢？从方法上看，詹姆逊仍然采用微观分析与宏观审视相结合的方法，把布莱希特置于社会文化历史的宏大框架之内，将其与广阔的社会经济境遇有机地关联起来，从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出那已经被淹没了的部分。颇为有趣的是，詹姆逊在书中所大量采用的恰恰是布莱希特所一贯倡导的“间离”手法，亦即陌生化手法，这样，布莱希特那些现已被埋没但无疑仍然渗透于当今世界方方面面而不为我们所意识到的有用的思想，便会被有效地“间离”出来，从而还其以全新的认识。正如詹姆逊所说，我们对布莱希特的生活和作品的探讨并不在于这种生活和作品富有意义，“而在于这种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促成了一系列的作品和表达，或在自身周围汇聚成一个碎片的溪流。”^①因此，要探讨布莱希特的有用性，首先必须深入到他的生活和作品中去，而这就等于是进入他个人的或那个时代的历史。

布莱希特的创作生涯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1933—1947年间的流亡时期为其创作高峰；1948年以后则主要从事戏剧实验，实践自己的戏剧理论。从时间上看，布莱希特的主要创作活动发生于现代主义的高潮期，而他的创作本身又是断续的和破碎的；这样一个偶然的歷史机遇把他卷入到现代派的阵营之中。以此为起点，詹姆逊把布莱希特的生活和创作分成不同的历史层面：首先是魏玛时期和犬儒主义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布莱希特经历了纯粹的现代经历——从林登堡到芝加哥，从广播到夜总会，从失业到戏剧实验，从古老的西方资产阶级到邻居崭新的苏维埃实验；

① 引自《布莱希特与方法》。以下引文除另注外均同此出处。

其次是集体合作的层面，其中包括超越个人风格的“布莱希特式风格”的形成，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文本的盗用，以及其他合作者的努力和成果的剥削利用；第三是戏剧本身的层面，对布莱希特以及对詹姆逊来说，这个层面都标志着对集体和社会的象征，标志着对政治哲学和时代问题的深层探讨——戏剧文本叙述的是人类历史，剧院是整个社会的微观体现，因此是“象征的乌托邦式寓言的一个实验空间和集体实验室”；这又涉及到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层面：他的戏剧实验和叙事理论，他提出的“间离效果”，他运用自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及他提出的与戏剧实践紧密相关的诸多“建议”和“意见”。而这仅仅是就布莱希特作为剧作家和理论家的重要方面而言。如此从诸多方面历史地剖析一个作家，真可谓清澈见底，透入骨髓。那么，对具体文本或政治或经济或社会或历史或一行诗或一句台词又如何呢？我们不妨拣取詹姆逊对寓言的叙事性的精彩论述以窥其一般。

詹姆逊认为：“对文本的每一种阐释总是一种原型寓言，总是意味着文本是一种寓言：意义的整个构想总是以此为前提的，即文本总是关于别的什么。”这里，我们看到传统的文学体裁“寓言”已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已不仅仅是那种象征性地“说教”的道德故事，不是简单地用某一虚构的故事传达一个寓意，即是说，寓言在我们所论的现代和后现代的语境中已不是一种体裁，而成了一种方法，一种阐释工具，一种“在适当的时候才发挥作用的特殊信号”。

寓言具有寓意，但也是反寓意的。一事物可以意味它自身，也可以意味其反面，这就是寓言的表意机制。它的运作原理是同一性和差异性，是从对立向矛盾的转化；而这个矛盾一旦与更大的社会历史或经济境遇联系起来，寓意便产生了。当然，这样产生的寓意不是单面的，而是多层面的，如上面展示的布莱希特其人的诸多历史层面一样。因此，当我们用“寓言”阐释某一文本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这个文本事先设定的现实是什么？外在于这

个文本的历史指涉物是什么?进而继续追问“何以是这个事件?何以是现在?从过去无数的轶事中拣取这个特殊的历史插曲加以展示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显见于文本的字里行间,也可能隐含于文本内部的暗示和典故,更可能与文本产生的历史时代的特定境遇相关。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首先是关于科学家及其责任的问题,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伽利略想到奥本海默,从伽利略的科学实验想到原子弹的制造;这样,如果与该剧上演的时代相联系,它就具有了反战的寓意。而就具体的剧情来看,伽利略最后放弃科学而屈服于教会,按照上面的阐释,这无异于说奥本海默对制造原子弹这种杀人工具是默许的,且不论这种默许在战时和战后的西方究竟意味着什么。

詹姆逊指出,作为寓言艺术的文本(《伽利略传》)可以从四个层面加以阐释:第一是直意即历史的层面,伽利略和他的历史环境,科学实验和新事物的出现;第二是讽喻的层面,詹姆逊认为该剧讽刺的对象是奥本海默和最后向斯大林屈服的布哈林;第三是道德的层面,新物理学导致原子弹的爆炸和生灵的涂炭,科学的滥用可以使人想到斯大林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滥用(大清洗);第四是神秘解释或集体的层面,这涉及到中世纪神秘的或宗教的解释,如在最后审判中人类灵魂的净化和人类的集体复活,而在《伽利略传》中,则涉及到科学家的忏悔和灵魂净化;也有对当时更大的文化环境及对该剧自身风格向这个环境的妥协的暗示。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该剧具有詹姆逊曾详加阐述的自动指涉性。这种自动指涉性或许也包含着布莱希特的另一层用意:通过战争的寓意来培养德国观众和读众的“罪过感”和“耻辱感”,即对其国民进行集体再教育。

《布莱希特与方法》中不乏这种精辟的剖析,但这种剖析本身并不是目的。在对布莱希特卷帙浩繁的作品和复杂多彩的生活进行如此分析和评价的过程中,詹姆逊始终不忘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和历史观点衡量每一事物。他在布莱希特的作品中看到了

“从（宏观的）情节建构到微观的遣词造句等各方面起作用的一种方法，这是辩证法本身所包含的内容，亦即赋予辩证法以意义并使其与其他哲学方法或世界观相区别的东西”。在他看来，这种方法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使其成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一种新的美学，因此，他认为布莱希特“似乎是第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家”。何以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呢？布莱希特何以对我们今天有用？我们何以在当今状况下回归布莱希特呢？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在不具名字和不为我们所意识到的情况下渗透于当今世界的方方面面”。究其实，我们可以把詹姆逊认为布莱希特那些被埋没而对今天仍然有用的思想归结为一种布莱希特式戏剧美学，其中包括作为布莱希特辩证法核心的“间离”手法，它是通过罗兰·巴爾特的中介而对当今世界发生深刻影响的。

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并不等同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手法。按詹姆逊的解释，这是对新事物的间离，是要通过恢复新事物的过去而为那个过去创造一种历史性。我们不妨转引布莱希特的一段话来说明对新事物的这种间离：

如果在长期驾驶一辆摩登汽车之后我们再来驾驶一辆老式的T型福特车，那么对汽车的间离便发生了。我们突然又听到了爆炸声；发动机就是以爆炸的原理工作的。我们开始感到惊奇，这样一种工具，事实上是任何一种工具，不被动物拖拉竟然能够运动！简言之，我们现在通过把汽车理解成陌生的、新的、一种纯粹建设的技艺，简单说是一种非自然的东西，而理解了汽车。自然，显而易见甚至连汽车都从属于自然，突然揭示出它内部的非自然性，自然的观念现在也渗透着那种非自然性。^①

① 转引自《布莱希特与方法》。

不难看出，这种对新事物的间离蕴含着深切的历史感：过去的艺术品完全可能包含着这样或那样的间离效果，如果我们能用间离手法去间离那些效果，我们就能更生动地体验和领会作品，这就是间离手法在美学上引起的新奇感。然而，在詹姆逊看来，布莱希特的间离手法除了在表层上具有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概念外，它本身并不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它的终极表述，即包容前此一切表述（如恢复经验和知觉的鲜活性、表演的距离性、移情作用和同感或同情心的关闭等）的一种系统的政治表述，可以把熟悉的或司空见惯的东西重又变成“自然的”，把客体变成“历史的”，这一方面说明了事物的不变性和永恒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客体“是由人制造或建构的，因此也能够由人来改造或完全替换掉”。因此，在十八世纪，需要陌生化的、要揭示出全部怪异之处的“非自然的”东西就是作为贵族和等级制之意识形态基础的宗教，而间离效果则被用作揭露旧制度的虚伪性、揭示新生产资产阶级关于素朴和普遍人性等新观念的武器。

布莱希特是在一篇论述中国戏剧的文章中首次提出间离理论的：“艺术家观察自身……仿佛也在看着观众，说，不是这个样子吗？但他也看着自己的胳膊和腿，显示它们，端详它们，最后也赞美它们……”^①（中国）演员既为观众演出，同时也为自己演出；他既向自己展示动作，同时也为观众分解动作。这种分解式的自身“显示”和“端详”似乎暗示一种演员与自身的分离，它暗含着并促进了一种内在距离的产生：他所显示和端详的是进入角色的演员还是扮演角色的叙事演员？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都似乎脱离了主体而使自身成为被显示和被端详的客体，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后现代的无（消解）中心或主体的死亡？是否蕴含着多元性、异质性和主体地位的流动？是否意味着主观的、内在精神的分裂？

① 转引自《布莱希特与方法》。